

湘桂战役

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

XIANGGUIZHANYIYUGUILINWENHUACHENGDEXIANLUO

邓群 姚蓝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邓群,姚蓝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0

ISBN 7-80199-062-5

I. 湘... II. ①邓... ②姚... III. 湘桂战役—史料、评论
IV. K2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783 号

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

作 者 邓 群 姚 蓝

责任编辑:黄 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南宁市广香彩印厂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062-5/K·46

定 价:38.00 元

序

在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救亡战争的历史中，今年是湘桂战役和桂林沦陷的 60 周年。姚蓝、邓群同志的著作《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正式出版，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战役，是“河南会战”、“湖南会战”攻陷河南、湖南两省后，日军继续向广西省境进逼而发生的“广西会战”。湘桂战役中的桂林城防守备战，则是这次战役主要的组成部分。

湘桂战役，从 1944 年 8 月 8 日衡阳陷落于日军开始，中间经过 11 月 10 日桂林、柳州同时陷落，至 12 月 3 日独山陷落，12 月 4 日日军从独山撤出为止，长达 3 个月零 27 天。这次战役，作战规模之大，地域之辽阔，出动兵力之多（50 多万人），经历时间之长（118 天），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程度，都超过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1985 年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称这次战役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进攻战。

1944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有利国际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战场却出现大溃败的悲惨结局，这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对此，本书作出了详尽的记述和深刻的评析，认为这是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三级统帅有兵不发，实行“单纯防御，保存实力，依赖美援，坐等胜利”十六字方针所招致的结果。

著者对湘桂战役的论述，首先介绍敌人的作战意图，敌我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兵力部署，这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敌人入侵广西的时间、地点、以及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下的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等各级大小头目的名字，部队的番号和他们蹂躏八桂大地灭绝人性的兽行，都做了详细的查证和应有的揭露，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否认侵略中国历史的无耻言行。

国民党第一三一师师长阙维雍在担负桂林城防守备战的艰巨任务中，表现出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爱兵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及评价；同时，也对广西各地自发和自觉地组织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游击队、报仇队英勇杀敌动人心弦的事迹，给予崇高的赞扬。国民党广大中下级军官士兵，同阙维雍将军一样，在桂林城防的浴血战斗中，挺身而出，以身殉国，与桂林抗战文化城共存亡。特别是七星岩洞牺牲于日军瓦斯和烈焰的八百名抗日壮士，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正是中国人民这种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遭到可耻的失败。

国民党在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完全彻底地暴露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指挥上的混乱，以致享有“军事战略家”、“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无能为力挽救抗战最后一次战役的败局。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南抗战文化中心地位的桂林，上千名对中国现代文化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的文化人，目睹湘桂战役令人痛彻心肺的败局，深刻地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畏日如虎，是实行独裁、内战、卖国的腐败政府。因此，国民党政府声誉一落千

丈，众叛亲离，丧尽人心。作家秦牧回忆湘桂战役大溃败的血泪史，写出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绝望……如非结束这种黑暗统治，国家势将灭亡了”这样切中要害的肺腑之言。这段话反映出所有进步文化人和中国人民大众对国民党反动腐朽本质的认识。又如参与桂林城防守备战的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第四十六军副军长韩练成，通过这次战役，接受了桂林抗战文化的熏陶，强烈表示支持中共的抗日文化运动，并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伟大政党。解放战争后期，他毅然投奔到解放区。梁漱溟也从第三条道路上退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反美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紧紧地依靠民心所向这一根本有利条件，领导人民开展全国解放战争，以三年半时间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直接原因。本来中国人民深受八年战争之苦，亟需休养生息，但国民党政府却发动内战，妄图把人民重新推向苦难的深渊，广大人民忍无可忍，积极响应中共号召，投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去。

本书特别阐明，尽管桂林抗战文化城陷落了，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浩劫，损失难以计数；但是，桂林抗战文化奏响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响彻广西乃至全国上空。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奋起全民族抗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书还对湘桂战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桂中高地——桂平、武宣、金秀大瑶山交界的花蕾高地和大瑶山高地被国民党军轻易地弃守，武宣、象州随即陷落，柳州东、南、北三面立即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成了无险可守的孤城等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这是柳州先于桂林陷落，从而也导致桂林孤立无援而在同一天相继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军虽然占领了桂、柳两市和湘桂、黔桂两条铁路沿线，但是沿线的抗日人民武装、游击队、报仇队却不畏强敌，奋起反

抗，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

岁月悠悠，湘桂战役和桂林陷落，瞬息之间又是 60 周年！回忆昔日山城，腥风血雨，鬼哭神嚎，生灵涂炭，令人感慨！喜看今日桂林，如诗胜画，百花争艳，人民安居乐业，教人振奋。当我们告别民族耻辱，迎来祖国百业繁荣之时，切勿忘记过去，仍须警钟长鸣，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训。为此，读一读《湘桂战役和桂林文化城的陷落》，将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钟文典

2004 年 5 月 25 日

于桂林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及其目的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一号作战”的关系	(11)
日军的兵力部署及其外线作战的指导思想	(13)
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及其内线作战的指导思想	(86)
桂林城防守备战，阙维雍将军捐躯殉国.....	(121)
桂林陷落前后概况.....	(156)
桂林陷落期间各项损失统计表.....	(196)
桂、柳沦陷后，敌我兵力部署概况.....	(202)
中日双方在湘桂战役中得失成败的判断.....	(207)
湘桂战役期间，广西组建抗日人民武装概况.....	(216)
后 记.....	(247)

导 论

湘桂战役发生于中国八年抗战的后期 1944 年，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又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家正在崩溃瓦解，英、美、苏、中四个同盟国家即将取得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1943 年 2 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久，向德军发动反攻。7 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处死，意大利于 9 月向英、美投降，退出法西斯阵营。9 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自此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到了 1944 年，苏联军队对德军进行了 10 次歼灭性的打击，收复被德军占领的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同时，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日本的处境呈现愈来愈困难状况。1944 年 6 月 6 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8 月 15 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和马赛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的处境也开始陷入孤军作战和四面受围的绝境。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战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却出现了政治上愈加腐朽，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军事上呈现混乱的局面。国民党政府

实行避战观战，依赖英、美援助，坐等抗战胜利的方针，本书对此作了深刻详细的评论和分析。

一、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日军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节节败退。

1944年4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入侵南洋的南方军，并摧毁在华东、华南的中美空军基地，从河南发动了向国民党战场上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新的进攻。日军称这次进攻为“一号作战”。这年四、五月间，日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接着魔爪伸向广西，于11月间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得以完成。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最高统帅及各级统帅采取避战、保存实力的政策，除在少数战役战斗中进行了较剧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战斗是一触即溃，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从4月至11月这8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不仅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体制的混乱，而且充分地暴露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更是国民党经济腐败、政治腐败、文化腐败的延伸和集中反映，致使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遭到空前的惨败。

二、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和发展，却在湘桂战役中陷落，使人民大众和全国绝大多数文化人看清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国民党感到绝望，人心完全倒向代表中华民族并有希望领导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和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运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萌发的第一阶段；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初步发展时期，这是第二阶段；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撤退、逃难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相对集中于桂林，为大兴起的第三阶段；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至1944年11月桂林、柳州（是桂林文化城的卫星城）沦陷，为高度发展成熟的第四阶段。上述第一第二阶段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奠定基础时期。夏衍在《记〈救亡日报〉在桂林》一文中提及桂林文化城原来是有基础的。他说“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一般来说把桂林叫作文化城，看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广西在我们到来之前，文化、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进步力量都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先生为主任的一个颇有声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实际上，还应上溯到1932年10月至1939年这8年时间内，杨东莼、陈望道、邓初民、杨潮、熊得山、施复亮、沈西苓、千家驹、李达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已在桂林传播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所培养出来的数百名广西师专学生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进步文化人及干校学生1000多名，为建设桂林文化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客观存在的史实，有力地证明第一第二阶段是桂林文化城奠定基础的时期，第三第四阶段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并且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千余名文化精英云集桂林，他们通过文化教育机构、大中小学校、干校、学生军、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通讯社、新闻社、图书出版社等机构，以新闻、出版、教育、时事讨论会和各种学术活动报告会，并通过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图画、木刻、漫画、戏剧（如桂剧、话剧、评剧、京剧、粤剧、木偶、皮影、杂技）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抗日文化运动和文艺运动，推动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下，高高地举起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彻底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关于“他们无意征服整个中国，而只是想占有中国人口最多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加以开发，以利于帝国的经济利益”；“日本发动

战争目的是为大东亚创造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日本人是解放者”的狡辩。同时，对一些混淆视听的谎言，也给予了彻底的驳斥和揭露。如有位自称植田捷雄的人，宣称对中国出兵是“防止欧美的侵略”，“同时为拯救中国于赤化”，“最后所达到的大目的，就是中、日、满成为一体，建设东亚新秩序”。美国有位名叫约翰·亨·博依尔的人，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内战、卖国文化思想辩护，以揭露“通敌内幕”为标题，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歪曲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大汉奸，描绘成出于抵制左翼力量的强大发展才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曲线“爱国者”。并认为中国人民对汪逆汉奸的严厉谴责，是对历史的“误会”。蒋介石则亲自出面散布荒唐之极的颠倒黑白之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是什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①，通过驳斥和揭露，使人们看清了反动文人和政客的丑恶嘴脸。

第二，桂林抗战文化城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的，在上述四个发展阶段中，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1）通过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宣传，做好对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战工作，对桂系民主派和全国各地云集于桂林的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各界进步文化人，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2）各个部门、单位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支部、小组的广大共产党员，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总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长达14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主要通过“两校”（即1932年成立的广西师专和1939年成立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一会”（即有桂系“智囊团”之称的、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其名义是学

^① 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4页。

术研究团体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三军”(即以桂系名义组织,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其部分领导权的第一、二、三届广西学生军),以及其他文化部门单位的中共支部、小组的基层组织开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和抗日救亡群众文化运动的宣传教育。由于桂林抗战文化城始终由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思想组织领导权,高扬抗日救国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因而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这种十分突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国统区我党工作的光辉典型。

桂林之所以称为国民党统治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还由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许多因素所决定:

先说客观条件,桂林地处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交汇中心,也是国内与海外的交汇中心之一(另一交汇点是昆明);在历史上,蒋系南京政府与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排挤、消灭与反排挤、反消灭的矛盾,存在占有中原与问鼎中原的利益矛盾,因而在八年抗战中,桂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基础较重庆深厚(有1931年至1937年的文化基础),政治气氛相对重庆陪都来说,比较开明、进步、宽松。这几个客观条件决定着绝大多数文化名人愿意逃难到桂林,不愿意到重庆。

次说主观条件,至关重要的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十分重视桂林文化城的建设。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之时,周恩来立刻将中共所掌握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人员的三分之一转移到桂林,在“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武汉”之际,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武汉这个救亡运动中心转移到桂林。1938年10月之前,作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武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把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活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将这一卓有成效的宝贵经验,运用到桂林抗战文化城。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在向长沙撤退途中,恰与白崇

禧在湖北荆门相遇。白的座车发生故障要修理，周邀白坐他的车同行，作了一次长谈，几乎有关抗日的重要问题都涉及。周与白在怎样把抗战进行到底的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在持久抗战战略上，都认定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不单是军队抗战，还要发动人民大众抗战。这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共与桂系地方实力派建立统战关系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理论基础^①。周恩来还取得白崇禧的承诺，由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和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到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是南方局的驻桂办事处）。

以上这些主观上的思想领导条件和组织领导条件，与客观的地理交汇中心条件和蒋桂矛盾条件结合起来，就是桂林形成和发展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的根据。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1939年3月22日《救亡日报》在《充满着朝气的桂林出版界》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桂林已经成为西南文化中心”。1940年10月13日《救亡日报》发表徐迟的文章，其题目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是文协的心脏》，并说明“目前文协重要据点大致可有渝蓉黔滇桂沪八个所在地，以桂林地点最适中，……联络员的责任，应由桂林分会自动的负起”。还有曾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任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的刘季平在《回忆我在桂林两年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1938年秋，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进步文化人相继从上海、广州、武汉各地来到桂林，以‘八办’为中心，展开了大量的党的政治活动。广西的政治局面，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好，桂林逐渐形成我国西南后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据我了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上的重大决策，而贯彻党的方针，造成这样好的局

^① 广西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周恩来与广西”学术讨论会论文：《试论周恩来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面，周恩来同志是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①

桂林发展为国统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是中共在抗战文化思想上和在抗日的各种文化机构、部门、团体的组织上都发挥了领导作用的结果。这是连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都承认的事实。《国民党中央局关于共产党进入广西宪政促进会活动的调查报告》说：“广西共党分子潜入桂林文化活动者颇众，故广西宪政促进会之筹备人、宣言起草人，大都为共产党把持操纵”（文件存广西军区军史办公室）。在 1945 年的国共谈判中，邵力子与张治中有一段对话。邵力子对张治中说：“山高皇帝远，国外的个人或者团体即便打一发炮弹，又能抖出多大的威风？所以国民党的基石不在国外，而在国内。有道是：天子脚下多顺民。可这陪都在重庆确乎反常得很。我经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控制舆论的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大公报》，而偏偏是《新华日报》！嗨，共产党的这张机关报（按：桂林也有发行）简直就是悬在山城的太阳，在它的强烈照耀下，连我们英勇骁战的张治中将军，也不时感到头晕目眩、两股颤颤哩！”张治中对邵力子这刺耳的话，非但没有生气，反倒眨巴着眼睛，流露出一丝意外的喜悦。^② 正当桂林抗战文化城发展愈来愈成熟，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发挥其中心地位作用的时刻，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由河南会战、湖南会战依次发展为广西会战，这在中国方面称为湘桂战役。湘桂战役的主要战场就发生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这是出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长官张发奎意料之外的。长官部和长官张发奎原以为广西的东北面有湖南第九战区为屏障，广西的东南面有广东第七战区在前面挡着。及至长沙、

^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3 页。

^②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第四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5、96 页。

衡阳相继陷于敌手，方才仓猝备战设防。随着湘桂战役日益临战和日军铁蹄即将兵临城下，桂林国民党军政当局先后于6月、8月、9月颁发了第一、二、三次紧急疏散令，桂林上千名全国著名的文化人和几十万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战争颓势，既焦急又绝望，中华大片国土都沦陷了，还有什么地方可退啊？！随着桂林城防守备战和湘桂大撤退大溃败悲剧性战局成为现实，作家秦牧回忆这段血泪史时悲愤地说，当时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绝望。他说：“如非结束这种黑暗统治，国家势将灭亡了”。这段一针见血的话，代表了所有进步文化人和中国人民大众对结束国民党反动、腐朽、黑暗统治的强烈呼声。

1944年11月10日，桂林抗战文化城和作为桂林文化城卫星城的柳州同时陷落了。桂林文化城遭受劫难，日军疯狂地屠杀、抢掠、奸淫。他们凌辱湘桂、黔桂铁路沿线文化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史实罄竹难书，无以名状。本书所能搜集到的，仅是有代表性的若干史实。

桂林抗战文化城虽然陷落了，但是桂林抗战文化高举的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大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八桂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桂北、桂东、桂中、桂南、桂西到处都有八桂子弟自动自觉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抗日自卫队、抗日报仇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给予日军以重大的毁灭性的打击，涌现出了许多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

本书特别申明，关于日本侵略军侵入广西的资料，来自日本战史室《广西会战》一书，为保持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基本上按照其原有的立场、观点、文字语气、风格详细地加以引用。阅读时读者务必详细研究其立场和观点，加以分析批判。书中引入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时，作者深深感到日方资料十分详尽、条理毫不含糊，所记述的进军时间、地点、距离、方位，除极个别地方，几乎是精确无误的。这是为什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便以向外侵略扩张作为国策，变朝鲜、蒙古、中国为其殖民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求和，被迫割去了台湾、澎湖群岛，赔款白银2万万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由此得寸进尺，不断派兵侵略中国，派浪人、商人、汉奸深入中国内地侦察、窃取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情报，秘密测量中国各省地理概况，绘制成侵略中国的军事地图。要知道，测绘军事地图，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年几年可以完成的。没有十年八年以至几十年测绘资料为基础，是不可能绘制出军事地图的。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政客右翼势力，处心积虑吞并中国的野心是蓄谋已久的。之所以引用日本战史室资料，是因为它发人深省，希望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刻骨铭心地牢记这些史实，冷静而全面地观察与思考当今中日关系，鉴往警来，毋忘国耻，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本书指出的，日本有不少政客一直还在竭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承认它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散布挑衅正义的言论，企图煽动推翻铁证如山的侵略罪责。60年前湘桂战役的硝烟，永远不会再在八桂大地上复燃。当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和平发展时代及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是以发展、开放为其本质特征的。它与任何狭隘封闭、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毫不相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正在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制止称霸，才能粉碎侵略。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在60年前战胜亚洲最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战争的胜利，同样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才是对待历史、对待中日关系的正确态度。为此，撰写《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是正确看待历史，增强民族责任感与坚定民族自信心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负责任的态度。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及其目的

1944年1月，日军发布了实施“一号作战”的大陆第921号命令，指令其中国派遣军于2月3日，在南京召开方面军及各军参谋会议，下达有关“一号作战”的指示。^①这个“一号作战”计划，由日军第11军和第23军具体筹划执行。“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战役”，分为“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和“广西会战”。广西会战又称湘桂战役，而桂林城防守备战则是湘桂战役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豫湘桂战役是中日八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国统区内的最后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的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久、作战地域之辽阔，战争所造成的破坏，都超过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日军称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并声称这一战争的目的是要摧毁活跃在中国大陆的美国空军基地，防止中美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并确保日军在中国东海的海上交通，进而确保日本与派往东南亚的南方军部队的陆上联系。^②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广西会战》（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页。